

干，几乎包办了各个教研组的秘书职位。当时有个说法叫“秘书专政”，虽不大确切但也反映了相当的实际情况，这也是我班的一个特色吧。

几十年来，我班同学在各个工作岗位

上不断奋斗进取，虽然每个人境遇不同，但都作出了尽己所能的贡献。值得提出的是我班还出了两位将军，这在不属于国防专业的电机系来说应当是很不平常的了。

难忘清华

○王曰平（1963水利）

上京

1957年的高考属“马鞍型”，1956年招生24万人，1958年招生32万人，而这一年全国招生仅10.7万人。这年我们台州考区能有两人考上清华，实属不易，小县城都沸腾了。

我从未离开过小县城，为上北京，9月3日，我与同时考上清华的李谦民同学约好一起走。我们坐的汽车是烧木炭的，车速慢不说，到猫狸岭时人还要下来推车，推过最高处再上汽车。到了杭州已是傍晚，我们排队坐在车站广场上等进站，我把买来的包子放在手提袋上，不料被人一脚踢到地上，又抢去吃了。我俩都是第一次出门，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，觉得外面世界太乱了。第二天凌晨4点，我们坐慢车到了上海火车站。下午4点，才有上海—北京直达学生专列，可凭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免费上车。

有了杭州车站的经历，又听说上海小偷特别厉害，我们连车站广场都不敢去。就这样在候车室足足坐了12小时。我们两人从未见过火车，上车后两人轮流看行

李，从车厢这头走到那头，什么都新鲜。

经过48小时火车的长途颠簸，9月6日凌晨4点，火车停在北京前门火车站，大家兴高采烈地下火车。一离开车厢一阵寒气逼来，我们看到站台上的工人都已穿上棉袄了，而我们却穿着衬衣，有的还穿着短袖呢。好不容易等到早晨6点多清华的校车来了，车上下水八、水九的大哥大姐们，他们拿来棉衣、毛衣给我们御寒。那时坐火车人与行李是分开的，我们一穿就穿了两星期，待我们收到行李后才将棉衣、毛衣送还给大哥大姐们。

进校

新生是住在东区5、6号楼的。进校后已到吃中饭时分，我拿着校区地图找北饭厅，走过小桥，找到最漂亮的4号、3号、2号、1号楼，但就是找不到北饭厅。加上我“洋夹土”的普通话别人听不懂，更不敢问，当时广播喇叭里播送着广东音乐《彩云追月》，事过半个世纪，当我一听到这首曲子，就会想起当年饿着肚子找饭厅的情景。

我被分配到水22班，当时一二年级

□ 值年园地

不分专业，大家一起上基础课。我们的班长是尹双增，团支部书记是赵慧琴。第一次班会是各自介绍自己，就简单的几句话，我讲的别人听不懂，别人介绍我也听不懂。后来老乡彭龙生同学告诉我，要突破普通话关最好是跟广播学。于是我就拿着报纸天天跟着广播学普通话。经过一个月左右学习，居然能听懂老师讲课了。

劳动

当时的口号是“做普通劳动者”，进校后就到八达岭种树两星期。到八达岭可以看长城，大家都挺高兴。仅上了一年的测量学，1958年夏天就到雁翅实习一个多月。是测绘地形图，为将来修电站服务，这是真刀真枪，马虎不得。为了地形图标得准确，张镜林同学每天要多跑十多里山路，这可是骄阳似火的暑天，一天下来筋疲力尽。同学们的饭量大增，曹洪恩、曹

钟毓等一餐要吃八个馒头。

晚饭后我们可以休息，但班干部们还要开会，为同学们操心。记得有一天半夜，李志民同学起来一个一个摸着脑袋数，说是少了一个同学。待那位去小便的同学回来，说齐了，才又上床睡觉。

1958年冬天，我们又到王家园水库劳动，是一座能过水的试验土坝。我与李志民、王明坦、陈家伟住农民房，旁边有一口寿材，晚上都不敢一个人进屋睡。这是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，房内的钢笔水都结冰了。我们的工作检查上坝的砂石料是否合格。白天，我们站在寒风凛冽的大坝上一站就是十多个小时，晚上还要政治学习。记得一次政治学习是念社论，好多同学都睡着了。尹双增说：“怎么都睡觉啦，来，你来念”。我读了一段后一看，尹双增也睡着了。

后来大坝旁要打隧洞，调我与王明坦、陈家伟三人去搞测量，这是个立体拐弯的隧洞，直径才3米多，还要两头打，如测量不准两头打岔了可不得了。我们工作格外认真仔细，日夜连续奋战，连1958年除夕的饺子也没吃上。

测量画好的地形图由我送回学校。我坐下午的火车回校，车上的旅客都下车了，服务员打扫车箱时发现我还在睡觉，一看我车票是到清华园的，现已到西直门了，要我补票。他把我带到站长室，我说



2011年4月，水动专业成立五十周年与老师合影。左起：王曰平、朱爱菁、赵敬亭、高建铭、林汝长、李志民、瞿伦富

我是清华学生，身上没有钱。站长见我外面裹了件棉大衣，也不像大学生的样子，又未带学生证，就把保卫人员也找来了。幸亏地形图上的图签有清华大学水利系几个字，才放我走了。那已是半夜时分，我只好沿铁道走回学校。

打隧洞时我们三人测量定位，往往是炮响后烟未散，就冲进去画定位中心，石玉田去画打炮眼位置，就这样每天放样、放炮、清碴。隧洞两头打通时我已回学校，听说立体中心误差仅两厘米，真是不容易！为此，1959年《新清华》上还有我们三人的测量照片呢。

业 余

清华的业余活动是丰富多彩的。在音乐室，老师有教民乐的王震寰老师，还有教钢琴、管弦乐、声乐的老师。他们一般在周三、周六晚上与同学一起活动，此外还有辅导任务。我与张三戒就是王老师辅导拉二胡。每年五一、国庆，白天参加文艺大军，当时是为“荷花舞”伴奏，在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的检阅，晚上为同学们在天安门广场狂欢伴奏。有时周六晚在民族文化宫为中央首长跳舞伴奏。我见到过的中央首长有周总理、邓小平、彭真等。

记得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为北京市劳动模范演出，结束后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。我们未见过这么大场面的宴会，一桌能坐20人。人在这边根本够不着那边（当时无转盘），我们就从这边跑到那边去夹菜，彭真在上边发言未完，我们那桌已一扫而光。好在我们是在最后几桌，也未引起多大注意。

说起文艺活动，不能不提我们年级的

《永定河边红旗飘》，是讲测量实习事。当时年级党支部书记是陈宝瑜，文艺积极分子有曲文新、周兰芳、张克孝、董蕴琦等。那时建二编的京剧，讲的在是关帝庙建火电厂一事。还有无二雕塑剧都很有名气，曾到政协礼堂演出。周总理都上台祝贺，还讲了句“关公舍得拿大刀去炼钢啊”，引起全场一阵欢笑，至今难以忘怀。

入 团

我在高三时就申请加入共青团，但到高中毕业时还未批下来。1958年冬，水22班团组织委员张幼雯来找我，说共青团临海县委没有批准，取消了我的入团资格。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，后大哭一场。我问什么原因，张说不知道，并说你不能灰心，要继续争取，我相信你。我一连好几晚都没有睡好觉，心想反正家庭出身差，入个团都这么难，将来入党就更不敢想了。后来在张幼雯的帮助下，认识到自己不能自暴自弃，要有上进心。就这样，我更严格要求自己，终于在1960年4月23日加入了共青团，入团介绍人是陈起舜、李志民。

1984年我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92年被评为浙江省电力系统“优秀共产党员”，1993年获国务院“政府特殊津贴”。1993年还到中央党校学习。现在想起来我真要好好地感谢张幼雯同学，是她给了我努力上进的信心。

粮 票

学校的伙食是不差的，进校后在北饭厅吃饭，当时是包伙，每月12.5元的伙食费全交给食堂。早餐是馒头、豆浆、稀

□ 值年园地

饭，还有油条。中、晚餐有米饭、馒头，菜是一荤一素，还有放在大桶里的汤，对我来说是相当好了。我们有许多老乡在不同系，每到周日就打听哪个系的食堂有好吃的，就到那个食堂去聚餐。

到了三年困难时期，粮食、猪肉、油都紧张了，学校就给每人定量：每人每月33斤，肉票半斤，油2两，凭肉票、油票换荤菜票。粮票中每月仅6斤是细粮，即每天2两可买稀饭、米饭或馒头，其余为粗粮，只可买窝窝头。像我享受乙等助学金的每月可有12.5元的伙食费和3元的生活费。实行定量后每月伙食费可以节省3~5元，一年下来可回家一趟。当时学校号召每人每月节省2斤粮支援灾区或定量不够吃的同学。杨积珍同学每月都交5斤，李志民同学每星期都回家吃饭，每月多交2斤。我是班里的生活委员，每到月底，刘景辉、王秀隆、曹洪恩、张镜林

等到我处，我给他们一斤或半斤粮票，每次他们都连声说谢谢！谢谢！这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事。

上 课

清华校园真大，我们都要带校园地图去上课。校园中间有铁道，火车来了要等火车过去才能走过去。我们很羡慕有自行车的同学，我们班只有黄奋新、陈家伟两人有。

一进清华园，就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，逼着你去用功读书。这里没有星期天，没有节假日，晚上熄灯了，还有人躲在厕所念书，家在北京的同学也不敢回家。

当时上课主要靠记笔记，因为没有教科书。老师在课堂上满黑板地写，我们都要快速记。要擦黑板了，老师会问同学记好了没有，然后才擦。下课前在黑板上列上五六种参考书目，这都要到图书馆去借，

主要是俄文翻译版或原版，借晚了就借不到了。

有件事很有意思，就是几乎每个人看书都是将书立着看，从迎面看都是《红旗》杂志，这是怕被人说是死钻课本走“白专”道路。

清华的第一堂体育课都是马约翰老师在大礼堂上的，题目就是“动”。马老鹤发童颜，声如洪钟，在主席台上双臂举起如举重状，“动！动！生命就是运动！”这是我一生



2007年入学五十周年重聚清华园。左起：陈家伟、傅志友、王曰平、王明坦、（他班某同学）、叶雅华、杨积珍、杜祥璞、李志民、陈起舜

难忘的体育课。刚入学时我体重仅84斤，被编到预备组，学习练气功，打太极拳，使我一生受益。后来通过锻炼，身体坚实了，人也长高了。

专 业

1959年下半年分专业，我被分到水电站动力设备专业，即水动31班。这班共25人，其中一人是越南留学生潘庆，他与王明坦两人住在三号楼留学生宿舍。一个老师就教他们两人，课程设置也与我们不一样，是标准五年制。潘庆毕业后曾当过越南水利部的翻译，来中国好多次。这班还有五位留苏预备班转来的同学，他们是王人生、王明坦、王秀隆、杜祥瑞、张镜林。

水动专业是水、机、电三结合，从电机系调来潘隐萱老师教电机设计，张伟钺老师教电器、开关站设备，自动化系老师教自动化设备，水利部分由系主任张任教水工概论。水动教研室主任是赵敬亭老师，管教学的是姚志民老师；教水轮机设计的老师是姚志民、高建铭、林汝长，教调速器、控制系统的老师是梅祖彦，教流体力学的是李丕济老师；教水工金属结构的是杨越老师。这些老师年轻有为、朝气蓬勃，许多老师还住在集体宿舍，还未结婚呢！

专业实习先是到官厅水电厂认识实习，那是1961年冬季，我们第一次看到水轮机、发电机、调速器、高压开关等，什么都新鲜。第二次实习是到三门峡水电站，那是1962年冬季，这座电站是由苏联设计并提供设备的。机组单机容量为15万千瓦，水轮机转轮直径5.5米，是当

时国内最大的。其分瓣转轮要在电站工地现场焊接。为确保质量，从全国优秀焊工中挑选。经过多次筛选，东北云峰水电站调来的水电一局李发师傅胜出，是年仅28岁的七级焊工，最后经周总理批准焊接，一举成功。当时，电站工地一片欢腾，这使我觉得所学专业真了不起，坚定了我一生为水电事业奋斗的决心。

毕 业

我们是在1963年初提前半年毕业的。时间一缩短，老师就拼命给我们补课。我们毕业设计题目是紫荆关水电厂水轮机辅助设备选择布置，我的指导老师是姚志民老师。毕业答辩时，我的主考老师是马善定老师。答辩顺利通过，得了个五分，姚老师也挺高兴。

1963年1月26日，毕业典礼是在大礼堂举行，提前毕业的同学全校共1000多人。蒋南翔校长在大会上勉励同学要到第一线去，向工农兵学习，走又红又专的道路，把自己锻炼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劳动者。之后在大礼堂前草坪拍毕业照，我因要给当晚离校的同学发粮票等，未能参加拍照，真可惜。

至于毕业分配，我们是一心服从组织分配。填写分配志愿时，我知道的就三个地方，于是第一志愿是新安江，第二志愿是西津，第三志愿是青铜峡。在得知我们来自华东地区的徐杏谰、陈起舜、翁玉光和我四人都分配到新安江时，感到非常高兴。

1963年2月14日，我高高兴兴地到新安江去报到了。

2012.12.13